

不要讓「美日安保聯合聲明」窄化了我們的視野

陳明祺

清華大學社會所助理教授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行委員

Beyond the US-Japan Joint Security Statement: A Vision for Cross-Strait Peace from a Societal Perspective

Chen Ming-chi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Membe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recent US-Japan joint security statement put the China-Taiwan issue among the prior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new development might be interpreted as strengthening Taiwan's security in front of China's military threat. Howeve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over-emphasizing the military measures as a guarantee of the cross-Strait stability might actually wors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orce Taiwan into a proxy of competition between great powers. It instead proposes a bottom-up approach for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stand-off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by actively seeking cooperation with Chinese social activists on issues, such as labor and environment, addressing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both societies. The consensus emerging from such cooperation provides a more solid ground for long-term peac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美、日外交與國防部長2月19日在華府舉行美日安全諮商委員會，會議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首度將緩和台海緊張局勢，列為兩國「共同戰略目標」的一部份，並呼籲「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台海相關問題」。觀察家普遍認為，這是美、日兩個盟國半世紀以來，首度對台海的緊張局勢共同表示憂慮，其戰略意義不可等閒視之。

去年底以來，在經過了美國高層官員出現「台灣不是享有主權的國家」、「美國『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是美中關係最大地雷」等用語的不幸事件，而中國方面又正緊鑼密鼓地制訂所謂《反分裂國家法》之時，「美日安保聯合聲明」的出現，表面看來似乎對台灣主體性長期的追尋是一大利多。但若放在更大的後

冷戰亞太地緣政治發展的脈絡來看，此時台灣的應對至關重要：應對得好，可為台灣在新的亞太政經局勢中爭取到更有利的戰略地位；應對不好，則很可能成為21世紀亞太列強爭霸下的犧牲品。

「美日安保聯合聲明」反應列強爭霸暗潮洶湧

繼1990年代下半美、日在修訂兩國之間的安保協定，以「周邊有事」含糊帶入對台海問題的關切，這次兩國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所謂「2對2」）的聯合聲明，更進一步明確點出「透過和平對話解決台海相關問題」，是兩國的「共同戰略優先目標」（common strategic priority）。美、日

針對台海問題如此高規格的聯合聲明一出，立刻引來中國外交部的「嚴重關切」(grave concerns)，如同中國人民大學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時殷弘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所說的，「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發展，在此之前，日本從不公開將台灣問題視為他們的安全顧慮，這個動作顯露了日本政府與人民對中國日益增長的敵意。」也就是說，這個聲明讓中國政府最不滿的是，日本政府不再默認中國主張「台灣問題是中國內部事務」的立場（此外，由於「台灣關係法」的存在，如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所言，這個聲明僅是重述美國對台海問題的一貫立場）。

在日本兩部長赴美行前，日本國內各大媒體已率先大幅報導，日本對中國近年來在軍力上的增長，進而越來越可能以軍事手段處理台灣問題的憂慮。無獨有偶地，近日美國中情局長及國防部長，在不同場合也都表示了對中國海軍力量擴張的憂慮，並指出中國很快會在台海上取得軍事優勢。一個自一九九〇年代下半即在美、日軍方開始醞釀的圍堵中國的軍事聯盟幾乎呼之欲出，在這場二十一世紀的亞太列強爭霸戰中，台灣的選擇空間似乎極為有限。

列強爭霸強化由上而下的衝突解決邏輯

乍看之下，這個發展似乎為台灣安全帶來更大的保障。但如果我們把美、日、中、台在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關係綜合來看，這樣的態勢事實上單方面突出軍事的重要性，相對地擠壓其他面向的發展。換句話說，台海問題的軍事戰略面，會因為美、日圍堵中國策略的日趨清晰而被強調，近年實際上越來越重要的經濟、社會、文化面向則會被忽略，一旦軍事戰略議題取得主宰地位時，台海問題終局解決的想像空間將被壓縮，甚至只剩下軍事這個單一選項。如果台海問題只有軍事這個選項時，叫牌、出牌的人就只剩下華盛頓與北京，台灣將完全失

去主動性，一切行為以美國的戰略利益為依歸，屆時我們在類似巨額軍購與核四等議題上將更沒有議價空間。

列強爭霸將強化從外而內、由上而下的衝突解決邏輯，讓台灣成為一顆棋子，和戰取決於人，一般民眾難以置喙。即使列強因為忌憚戰爭的代價而強力介入謀和，這樣的和平也未必能夠持久。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由上而下菁英之間的政治妥協，或是從外而內大國強加的國際秩序，難以為長期處在對立狀態下的兩個社會謀得真正的和平，以巴之間短暫和平在千禧年之際的倏然崩潰及所引發的復仇循環，就是最好的例證。

由上而下邏輯抑制台灣主體性發展

回顧過去三、四百年台灣歷史發展，身處東亞列強勢力範圍交界處的台灣，承載了中、日、美三強勢力範圍調整時所引發戰火的殘害與歷史的斷裂，但同時也孕育了這塊土地上，相較於東亞其他社會較開放、多元而平等的文化，這樣的文化不但使台灣成為今日亞洲最動態的民主國家，也讓台商在東亞地區建立了世界最大、最富有活力的國際生產網絡。也就是說，身處東亞權力斷層帶上給台灣最大的負債，是潛在的軍事衝突與破碎的歷史記憶，但這個歷史宿命帶給台灣最大的資產，卻是全東亞最開放、多元、平等與民主的社會文化，以及作為美、日、中三強經濟與文化介面的獨特能力。從人類歷史經驗來看，這樣的社會文化資產而非任何強權的安全保證，才是台灣主體性長期發展的最大保障。

為了維護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與平等，有人提出「備戰方能止戰」的思維。這樣的想法固然有所本，但是一個投入大量資源備戰的社會，面對到的不只是投入維繫平等與正義的資源匱乏，同時還會使整體社會陷入一個緊張的準戰爭情境，壓縮開放和多元的空間。近年，兩岸關係緊張在台灣造成國防預算增加、族群矛盾

加劇、相關的人權問題與公共領域論述品質惡化，正是我們為了備戰所付出的沈重代價。同時，在對峙的狀態下，一方升高武備一定會引起另一方相對應的投入，使雙方同陷「安全困境」之中。尤有甚者，「備戰」往往會成為自我圓說的預言而終於導致兵戎相見。

從社會出發尋求真誠永久的兩岸和解

現時攤鋪在檯面上的和平方案，大抵是以大國的利益出發，追求各方政治菁英間的暫時妥協，由強權來作為休戰保證者和爭端仲裁者。這樣的和平欠缺真實的社會基礎，容易因為偶發事件而遭到顛覆。而且強權也可能因為利益計算的改變，從中立的第三者轉而成為促發戰爭的操縱者。

如果強權介入和積極備戰都不足以導致和平，那和平該建立在什麼基礎上？

中國與台灣之間要謀得和平，更重要的是兩邊進步人士從同情理解出發，進而在各個社會議題上逐步合作，在共事求取共識，共同追求兩個

社會的民主與平等。即以勞工運動為例：台灣的勞工今日面對的是資方惡意關廠倒閉，到中國另起爐灶；而中國一大部分勞工面對的，是包括台資在內的外資廠商為了追求利潤，在國家縱容之下所建立充滿危險與惡性剝削的勞動環境。在這個議題上面，兩邊的勞工運動具有共同利益，一國之內的勞工運動不足以解決勞動者面對的苦境，所以運動必須是跨越國界的。與此類似的還有農運、環境運動與婦女運動等。

台灣從八十年代以來與威權體制鬥爭的實踐經驗，不但提供中國逐漸滋長茁壯中的市民社會一個可資借鏡的典範；把運動拓展到中國去，積極尋求合作夥伴，更是一個運動發展邏輯的合理發展。隨著中國市民社會漸次成熟，從而催生中國民主體制的出現，讓中國的政治過程更加開放、更加透明，這才是台灣安全的最佳保障。這樣的和平，不是一個消極避免戰禍的權宜之計，而具有促進兩岸平等、正義、開放與民主的積極意涵。和戰之間，不是一個強權夾縫中為了生存的權宜計策，它其實是一個倫理的抉擇。